

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测度 及区域模式比较

——以苏州、杭州为例

魏培晔 张嘉琪 宋 鹭

摘要: 经济人文化与人文经济化是推动经济与人文互济共兴的两条重要路径。苏州与杭州是中国人文经济的典型实践样本,文章通过构建包含“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以文兴经”“以经成人”“以人新文”六个维度的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整合多源数据构建两地人文经济发展横截面数据集,经定量测度与比较分析发现,苏州与杭州呈现出差异化的人文经济发展模式。苏州体现了经济人文化的发展逻辑,在“以经育文”“以经成人”维度优势明显,呈现出以经济支撑文化民生的强基特征;杭州则体现了人文经济化的发展逻辑,在“以文兴经”“以人促经”维度表现突出,呈现出文化要素向经济动能转化的高效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提炼了两类发展模式的共性基础与分化路径,并分别针对发展路径侧重不同的城市提出实现经济与人文互济共兴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人文经济; 指标体系; 区域比较; 经济人文化; 人文经济化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5.005

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是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辩证逻辑。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这一重要论述提到了人文经济学,并指出苏州和杭州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人文经济发展的典型实践样本。

人文经济学聚焦“人”“文化”“经济”的有机统一,旨在研究经济和人文相互转化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理^②。经济与人文之间存在双向驱动关系^③,经济手段可以支撑和促进文化繁荣,文化资源和人文精神则可以赋能经济增长。经济人文化与人文经济化作为人文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面向^④,也是实现经济与人文“互济共兴”的核心机制,但其在城市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及差异化路径仍有待深入分析。

基于此,本文选取兼具历史文脉与现代经济活力的苏州、杭州作为比较对象,重点回答三个问题:

基金项目: 苏州市社科基金项目“智能时代苏州人文经济学‘三个高地’建设与完整闭环对策研究”(Y2026LX102);苏州市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技术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SZS2023007)。

作者简介: 魏培晔,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讲师(苏州 215123; weipeiye@ruc.edu.cn);张嘉琪,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讲师(苏州 215123; jq_zhang@ruc.edu.cn);宋鹭(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副院长、人文经济苏州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 215123; songlu@ruc.edu.cn)。

① 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1版。

② 洪银兴:《人文经济学: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光明日报》2025年7月22日,第11版。

③ 桑明旭、徐星美:《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

④ 龚天平、吴银霞:《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文经济学价值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洪俊杰、刘海明:《人文经济学的学理逻辑与未来研究展望》,《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1期。

两市人文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发展模式有何异同;未来如何实现经济与人文互济共兴。苏杭两地都探索出各具特色的人文经济发展模式,既体现了人文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呈现出差异化的实践路径,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维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优化了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苏州与杭州人文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定量测度,弥补了现有人文经济学研究在实证量化维度的不足;二是基于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识别并归纳出苏杭两地差异显著的人文经济发展模式,为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路径与方法参照;三是深化了对苏杭经验的理论总结,为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探索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分类指导的实践方案与经验证据。

二、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说明

人文经济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人—文化—经济”三元协同^①。这也意味着人文经济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内涵,既包含经济的人文化维度、人文的经济化维度,也包含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维度、经济发展的人文取向维度^②,因此,相较于传统单一经济发展的衡量,人文经济发展的统计核算和量化比较更为复杂。因此,研究选择使用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经济苏州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按照系统性、动态性、科学性 & 数据可得性的原则对其进行优化。

(一) 指标体系主体框架

人文经济中的人、文化、经济各有其位,相互作用,构成有机整体。首先,“人”既是承载经济与文化的实践主体,也是经济与文化发展所指向的价值归宿^③;其次,“文化”既是社会团结的精神纽带^④,也是经济生产的特殊要素与创造力源泉^⑤;最后,“经济”是物质基础^⑥,其价值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繁荣得以实现。立足“人—文化—经济”三元互动的理论共识,构建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含“目标层—机制层—效果层”三级框架:目标层由“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以文兴经”“以经成人”“以人新文”6个一级指标构成;机制层包含19个二级指标;效果层包含36个三级指标。研究将“以经育文”一级指标下的两个二级指标“文化产业基金”“文化研发强度”合并为“文化产业投入”,旨在将分散的投入类指标进行整合,二者均从资源注入维度衡量“以经育文”的支撑力度,合并后更契合指标体系的层级逻辑,避免因划分过细而导致的结构冗余,优化后的指标体系主体框架详见表1。

1. “以文化人”强调文化对人的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与行为实践的塑造作用,潜移默化地提升个体的文化素养、丰富其精神世界,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⑦。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文化教育投入为基础,为学校美育、社会宣教、文化传承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夯实以文化人的物质前提;以文化素养提升为核心,通过提升公民的文化鉴赏能力、厚植其人文底蕴,使文化滋养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气质;以人文精神弘扬为灵魂,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融入日常,让尊重人、关怀人、发展人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自觉。因此,研究从“文化教育投入”“文化素养提升”“人文精神弘扬”3个维度构建“以文化人”的二级指标体系。

2. “以人促经”强调将“人”作为贯穿经济增长全过程的核心要素^⑧。从需求侧看,人是消费的主

① 郭新茹、唐月民:《人文经济视域下新型文化业态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学术论坛》2025年第6期。

② 陈立旭:《理解人文经济》,《浙江学刊》2024年第6期。

③ 郭丽双、王绍鹏:《人文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三重批判与超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④ 胡安宁:《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学海》2024年第3期。

⑤ 曹劲松:《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江海学刊》2025年第4期。

⑥ 魏鹏举、冯星宇:《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形成、基本内涵及内在逻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⑦ 孙俊芳:《人文经济学:标识性概念与建构路径》,《新视野》2025年第2期。

⑧ 周文、钟锦宸:《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文化主体性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体,通过人文消费需求的释放,牵引供给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从供给侧看,人是资本的载体,通过健康、教育、文化等人文资本的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支撑;从动力侧看,人是创新的源泉,通过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不竭动力。因此,其二级指标包括“人文消费驱动”“人文资本赋能”“人文创新催化”3个维度。

3.“以经育文”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所积累的物质财富与资源配置能力,为文化繁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支撑^①。资金保障方面,应通过加大文化产业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加大研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为文化项目的落地运营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空间载体方面,应通过完善文化基础设施,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为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夯实硬件基础;内容供给方面,应通过优化文化产品供给、丰富文化活动供给,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多元、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本文从“文化产业投入”“文化基础设施”“文化资源供给”3个维度构建“以经育文”的二级指标体系。

4.“以文兴经”是指将文化作为价值内核与创新要素嵌入经济活动的全链条,实现文化势能向经济动能的系统性转化^②。“以文兴经”的二级指标包括“文化传承创新”“文化经营贸易”“文化旅游融合”“城市营商环境”4个维度。文化传承创新方面,通过激活文化遗产、传统技艺、艺术创作等文化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经济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附加值;文化经营贸易方面,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扩大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收益,拓展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文化旅游融合方面,通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资源开发、业态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催生文旅新场景、新体验、新消费^③;城市营商环境方面,通过营造尊重创新、开放包容、诚信法治的人文环境,吸引人才、集聚要素、激发活力。

5.“以经成人”旨在确立经济发展的人本取向。“以经成人”强调在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将物质财富的积累有效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生活改善与自主发展能力提升,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与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④,其二级指标包括“居民生活保障”“发展机会拓展”“共享福祉提升”3个维度。其中,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人本取向的制度性兜底,其覆盖程度反映经济发展成果能否通过制度安排转化为居民普惠、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缺乏普惠保障的经济增长难以充分体现“以经成人”的价值旨归。

6.“以人新文”旨在确立“人”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动力来源^⑤。其一,人作为文化成果的创造者,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与媒体传播等多元形式,持续推动文化的当代表达与内容再生产;其二,人作为文化组织的运营者,依托社会组织与市场实体等载体,将文化创意有效转化为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三,人作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者,通过非遗保护、古迹活化等实践路径,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实现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其二级指标包括“文化成果创造”“文化组织运营”“人文历史活化”3个维度。

(二)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借助R语言软件实现权重计算,步骤如下:(1)梳理指标间的逻辑关系,构建递阶层次结构模型;(2)基于九标度法,邀请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16位专家参与打分,研究方向涵盖人文经济学、公共文化服务、数字经济、产业经济、城乡发展等领域,兼顾人文、经济与管理三大学科板块,由其对同一层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构建判断矩阵;(3)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同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6个一

① 洪俊杰、刘海明:《人文经济学的学理逻辑与未来研究展望》,《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1期。

② 孙俊芳:《人文经济学:标识性概念与建构路径》,《新视野》2025年第2期。

③ 兰岳云、陈觉、胡超:《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及演化研究——以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为例》,《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年第8期。

④ 罗卫东:《人文经济学的建构方向和实践路径》,《光明日报》2025年8月5日,第11版。

⑤ 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级指标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235,各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判断矩阵的CR值依次为0.0248、0.0097、0.0287、0.0132、0.0043、0.0000,全部低于0.1的阈值标准,表明专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4)根据层次结构计算各层级指标的综合权重^①,详见表1。

表1 中国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及权重、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数据来源
以文化人	18.62%	文化教育投入	7.21%	公共财政中文化与教育支出占比	4.75%	市统计年鉴
				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2.46%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资质单位名录
		文化素养提升	5.18%	人均年图书借阅量	2.81%	市全民阅读调查报告
				每万人公共文化活动参与人次	2.37%	市文化和旅游局
		人文精神弘扬	6.22%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数比重	2.92%	市志愿服务网
				社会捐赠规模	3.30%	市慈善总会
以人促经	16.32%	人文消费驱动	4.81%	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2.60%	市统计年鉴
				文化类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2.21%	城市统计局商业贸易统计、市文化和旅游局
		人文资本赋能	4.28%	文化类新企业注册数量	3.47%	企业注册行业数据
				艺术类高等教育毕业生占比	0.81%	市教育局、高校就业报告
		人文创新催化	7.23%	创意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5.11%	市统计年鉴
				文化相关专利数量	2.12%	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
以经育文	14.35%	文化产业投入	2.11%	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年度投入规模	0.89%	地方政府金融办、发展改革委报告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1.22%	上市公司半年报、年报
		文化基础设施	7.22%	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积	5.0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2.21%	公共图书馆
		文化资源供给	5.03%	年度文化产品新增供给数量	2.39%	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年度公共文化活动供给场次	2.64%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公报、市文化和旅游局年报、票务平台公开数据
以文兴经	21.27%	文化传承创新	7.69%	中华老字号企业数量	2.22%	商务部中华老字号认定名单
				企业家精神 ^②	5.47%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精神数据库
		文化经营贸易	3.84%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1.84%	城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① 为验证权重稳健性,研究采用刀切法(Jackknife)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MAPE为5.2398%、CS为0.9981、SRCC为0.9806,权重向量具有较高稳定性。

②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精神数据库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标,但该数据库样本仅限上市公司,故对杭州未上市民营科技企业及苏州外资制造企业的代表性不足;此外,其“爱国”“社会责任”等维度对外资企业的适用性亦受制约。基于上述局限,相关结果可能存在测量偏误,后续研究可考虑纳入“每万人拥有中小企业数量”等指标予以补充验证。

续表 1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数据来源
				文化服务贸易额	2.00%	商务部《服务贸易发展报告》、各地商务局
		文化旅游融合	3.65%	文化IP与旅游项目联动数量	3.65%	地方文旅部门的产业融合报告
		城市营商环境	6.0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6.09%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
以经成人	18.59%	居民生活保障	7.7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	市统计年鉴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3.33%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公报
		发展机会拓展	4.41%	每万人拥有企业法人单位数	2.34%	市市场监管局、统计年鉴
				城镇登记失业率	2.07%	市统计年鉴
		共享福祉提升	6.47%	城乡居民收入比	2.95%	市统计年鉴
				居民幸福感	3.5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
以人新文	10.85%	文化成果创造	5.15%	近十年每百万人拥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立项数量	2.09%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公告、市社科联年度统计报告
				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 ^①	3.06%	剧查查(DataEye)《2025中国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
		文化组织运营	1.65%	每万人拥有文化类社会组织数量	0.69%	市民政局
				每万人拥有文创类企业数量	0.96%	中国工商注册数据库
		人文历史活化	4.05%	每百万人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	2.66%	市文化和旅游局
				每百万人拥有历史文化名人数量	1.39%	地方志办公室、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名人档案

三、苏杭人文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评价

以 2025 年为分析报告期,实际数据采用各指标最新可得年份(主要为 2023—2024 年),构建苏杭两市人文经济发展横截面数据集,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考虑到人文经济指标涉及文化转化、人文感知等多个维度,部分指标在现行官方统计体系中尚未单独立项或存在统计滞后,本文优先采用官方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的最新可得数据(多为 2023—2024 年),对无法直接获取的指标则采用替代变量或多源数据融合方法。根据采集数据计算原始三级指标取值后,研究采用比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标准化值等于原始值除以两市最大值,负向指标标准化值等于两市最小值除以原始值,并以线性加权方式计算两市在 6 个一级指标下的得分,以雷达图呈现分析结果(见图 1)。

① “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采用剧查查(DataEye)《2025 中国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指数值,杭州为 83.3,苏州为 74.0。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两市数字文化内容生产与产业发展水平。由于指数涉及商业数据且具体算法未完全公开,其结果可能受到数据覆盖范围和指数构建方法影响,仅用于两市相对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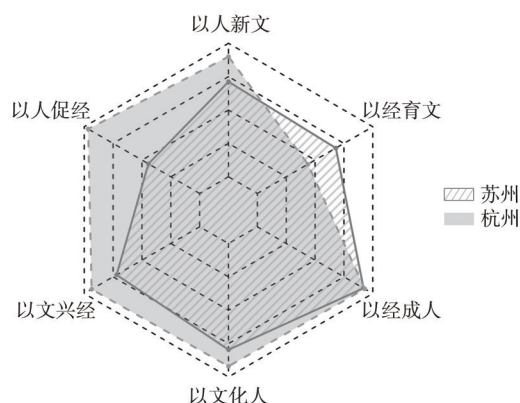


图1 苏州与杭州的人文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苏杭两市在人文经济发展的六个维度上各具优势,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与鲜明的地方特色。研究目的在于识别两市人文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与模式差异,而非追求各指标的绝对量值精度,上述数据处理策略在横向比较的研究目标下具有方法论合理性。以下从六个维度展开分析。

在“以文化人”维度,杭州凭借“文化教育投入”与“文化素养提升”的持续积累,综合得分略高于苏州。其主要原因在于,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城市,集聚了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一批高水平院校及省级文化机构,教育资源禀赋优越,财政对教育文化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大;同时,杭州较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活动覆盖面更广,居民文化素养积淀更为深厚。相比之下,苏州在“人文精神弘扬”维度表现更为突出,社会捐赠规模较大,反映出苏州民营经济发达、本土商会组织活跃,企业家的乡土情怀与责任感较强,形成了崇文重教、乐善好施的地域人文传统。

在“以人促经”维度,杭州优势显著,综合得分明显高于苏州,这一优势主要来自“人文资本赋能”与“人文创新催化”的协同发力。这得益于杭州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集聚,催生了浓厚的创业创新氛围;同时,杭州较早布局人才强市战略,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政策体系,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活力释放形成良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苏州在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略高于杭州,表明其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较为充沛,具备进一步释放人文消费驱动效应的基础。

在“以经育人”维度,苏州综合得分明显领先,呈现出以经济实力反哺文化发展的路径特征。苏州在“文化产业投入”与“文化基础设施”两个子维度上优势明显,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力度持续加大:苏州工业园区、高新区等板块在产城融合中高度重视文化配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设施布局密度高、标准高;市级文化产业引导基金规模较大,对重点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较强。而在“文化资源供给”方面,杭州表现更佳,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略占优势。

在“以文兴经”维度,杭州优于苏州,尤其在“文化遗产创新”“文化经营贸易”与“城市营商环境”三个子维度上表现突出。这与杭州的数字基因和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杭州依托数字技术优势,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产业化运营;同时,杭州民营经济活跃、市场意识强,文化企业数量多、活力足,文化贸易规模领先。苏州则在“文化旅游融合”方面表现更好,依托古典园林、大运河、古镇等世界级文旅资源,在文旅场景创新方面成效较为显著,反映出其资源禀赋与产业融合路径的独特优势。

在“以经成人”维度,两市水平相当,表明经济对人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在两地已形成相对均衡的格局。从子维度来看,杭州在“居民生活保障”与“共享福祉提升”方面表现更佳,这与其作为省会城市拥有的优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优势有关;同时,浙江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杭州在收入分配调节、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政策力度较大。苏州则在“发展机会拓展”方面更具优势,

其外资经济发达、制造业基础雄厚,就业岗位丰富、职业发展通道多元,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

在“以人新文”维度,杭州得分略高于苏州,优势体现于“文化成果创造”与“文化组织运营”两个子维度,说明其在人文要素驱动文化创新方面更具活力。这与杭州活跃的数字内容产业生态密切相关:以影视创作、网络文学、动漫游戏为代表的文化内容生产业态集聚度高,涌现出一批头部文化企业和创作团队;同时,杭州文化类社会组织、民营文化机构发育较为充分,文化运营的市场化程度高。苏州则在“人文历史活化”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依托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非遗传承保护、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技艺创新等方面形成特色路径。

四、比较分析:苏州与杭州人文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上述六个维度在两类人文经济发展路径中承担不同的理论功能。其中,“以经育文”“以经成人”主要体现经济发展成果向文化与人的反哺,是识别“经济人文化”路径的主要表征;“以文兴经”“以人促经”主要体现文化与人文要素向经济动能的转化,是识别“人文经济化”路径的主要表征;“以文化人”“以人新文”则体现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塑造,是两条路径的共享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映射反映的是不同维度在模式识别中的相对作用,并非排他性的类型归属。

从加权得分来看,苏州在“以经育文”“以经成人”维度表现突出,发展逻辑更接近经济人文化路径;杭州在“以文兴经”“以人促经”维度优势明显,更接近人文经济化路径。这一差异属于程度差异而非性质对立,两地均存在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复合驱动,只是作用侧重不同。下文从共性基础与分化路径两个方面展开比较。

(一)共性基础:人文禀赋的深厚积淀

从测算结果看,苏州和杭州在“以人新文”与“以文化人”两个维度均表现突出,这既源于深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包容宜居的人文环境,也得益于制度创新、市场参与、人才集聚和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两市均重视文化传承创新与公共文化服务,在人文历史活化、文化创新和文化育人方面形成了较为坚实的共同基础。

“以人新文”强调人在文化创造、传播与创新中的主体作用^①,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包括现代文化形式与内容的持续创新。现实中,苏杭在“人文历史活化”“文化成果创造”“文化组织运营”等方面均有较好表现。苏州依托“美遇苏州”文化惠民工程推动高雅艺术与传统曲艺进校园、进社区,并将古建老宅活化为非遗体验、曲艺展演等公共文化空间;杭州在保护西湖、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推进良渚文化、宋韵文化等文化基因转化利用,并依托阅读共同体整合多方资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共享。

“以文化人”则强调文化对人的教育、濡化与精神塑造作用^②,通过优质文化供给和健康文化环境提升个体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对此,苏州以馆校合作推动文化资源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并依托新时代志愿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市17个系统平台数据,提升志愿文化服务效能;杭州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艺术普及体系和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现代化农民教育体系,并以文化特派员制度激活基层文化生态。

(二)分化路径:经济人文化与人文经济化

苏州人文经济发展模式集中反映了经济人文化的演进逻辑,体现为经济成果向文化领域的溢出与反哺。经济人文化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融入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使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物质产出,

① 孙俊芳:《人文经济学:标识性概念与建构路径》,《新视野》2025年第2期。

② 曹劲松:《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江海学刊》2025年第4期。

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精神需求的满足与社会的全面进步^①。其核心内涵在于经济发展为人文关怀提供物质基础,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②,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在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体现为“以经育文”和“以经成人”。经济人文文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在经济政策与产业规划中融入人文指标,如教育、文化、健康等社会福祉指标,推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通过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建设数智化、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化产品的可及性与多样性,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通过制度设计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缩小文化资源分配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在“以经育文”维度,依托外向型经济积累的雄厚财力,以及制造业基础所形成的资源配置能力,苏州在文化产业投入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优势明显,形成了“政府主导、硬件先行”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其外资制造业结构和开发区治理传统密切相关,长期形成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产业集聚逻辑延伸至文化领域,表现为政府统筹、国有平台参与的文化建设机制。以姑苏区为例,古建老宅活化主要依托古城保护部门与国有平台协同推进。苏绣产业的发展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其依托苏州刺绣研究所(国企运营)、政府专项资金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培育体系,形成标准化产业链。相关三级指标亦形成印证,苏州“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年度投入规模”和“每百万人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量”的标准化得分均高于杭州,体现出其政府资源投入与非遗传承体系的相对优势。

但重投入、重硬件的模式也存在文化设施运营效能和产业转化不足的问题。指标测算显示,苏州在“人文创新催化”(创意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文化相关专利数量)和“文化经营贸易”(文化服务贸易额)方面与杭州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文化投入向创新产出和市场价值转化仍有提升空间。在“以经成人”维度,苏州凭借外资经济与实体经济提供的就业空间,在“发展机会拓展”方面表现突出,体现了经济增长成果向居民发展能力的转化。

杭州人文经济发展模式集中反映了人文经济化的演进逻辑,体现为文化要素向经济领域的渗透与转化。人文经济化是指将文化资源、人文精神转化为经济动能,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深度融合^③。其内涵在于通过市场化、产业化手段,将传统文化、艺术、思想等精神形态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④,在本文的指标体系中体现为“以人促经”和“以文兴经”。人文经济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一是文化资源的经济化利用,如依托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等发展文化旅游、文创产业,实现文化价值的经济转化;二是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推动影视、出版、设计等领域的产业升级与创新,提升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拓展文化表达与传播方式,催生数字文化、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业态^⑤。

在“以文兴经”维度,凭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与活跃的民营经济,杭州在“文化遗产创新”“文化经营贸易”与“城市营商环境”方面表现突出,形成了“市场驱动、内容为王”的发展路径。平台经济强化了文化内容传播、用户集聚与商业变现的市场逻辑,并催生“社会资本介入与业态植入”的文化运营模式。良渚文创即为典型:依托万科良渚文化村等社会资本,通过“文化遗址+文旅业态+民宿社区”推动文化遗产向经济价值转化。相关指标亦形成印证,杭州“每万人拥有文创类企业数量”和“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标准化得分均高于苏州,体现出其在文化市场主体培育和产业价值转化方

① 邓智团、郭红星:《人文经济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学术月刊》2024年第12期。

② 任平、李扬、战绍磊等:《人文经济学: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笔谈)》,《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③ 洪俊杰、刘海明:《人文经济学的学理逻辑与未来研究展望》,《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1期。

④ 陈立旭:《理解人文经济》,《浙江学刊》2024年第6期。

⑤ 孙俊芳:《人文经济学:标识性概念与建构路径》,《新视野》2025年第2期。

面的相对优势。

但市场驱动也伴随着公共文化投入的相对不足。杭州在“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业投入”方面存在相对劣势,反映出“重流量、轻基建”的结构性短板。与此同时,依托省会城市集聚的教育文化资源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杭州在“文化教育投入”和“文化素养提升”方面仍具有较好基础,以文化浸润人心、以人文滋养社会的效应持续释放。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苏州与杭州分别视为以经济人文化和人文经济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这一概括反映的是城市整体层面的相对侧重,并不意味着城市内部各区域均遵循同一发展逻辑。苏州工业园区更突出以文化设施投入服务产城融合与人才集聚,姑苏区则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和非遗资源强化古建活化与文旅融合;杭州滨江、余杭等数字经济核心区更强调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西湖风景名胜区、淳安等区域则主要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发展文旅融合。由此可见,同一城市内部亦存在不同的人文经济实现机制,本文的二分框架是城市总体特征的类型化概括,分析结论需注意城市尺度与区域尺度之间的差异。

总体而言,苏州更接近经济人文化路径,强调以经济增长反哺文化建设和民生改善;杭州更接近人文经济化路径,突出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的转化。两种模式的分化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但更准确地说,是结构约束下政策选择的结果。苏州的外资制造业基础和开发区治理传统形成了重规划、重配套的路径惯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又强化了政府在文化保护与利用中的统筹作用;杭州的民营经济和数字经济为文化市场化提供基础,地方信息经济发展战略及G20峰会、亚运会等重大事件则形成了政策与建设动力。因此,两地模式并非经济结构的机械投射,而是地方政府在经济结构、制度约束、资源禀赋与政策目标之间权衡选择的结果。

五、实现经济与人文互济共兴的对策建议

苏杭两地的人文经济发展路径虽有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实现经济与人文的互济共兴。这一目标包含三重内涵:首先,“互济”是过程,体现在经济与人文的双向赋能上——经济为人文提供物质支撑,苏州以雄厚财力支持昆曲传承和古城修缮,杭州以数字经济激活文化创意与市井人文;同时,人文又为经济注入灵魂,苏州园林从私宅转变为城市文化资本,龙井由地方物产升华为文化符号,体现了人文价值对经济价值的赋能。其次,“共兴”是结果,追求城市整体的繁荣共生,既不让文脉为经济让路,也不让经济为文脉殉道,而是让两者在时空中共振共兴。更进一步,这种互济共兴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苏州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人文的反哺会成为内生需求;杭州的实践则揭示,深厚的人文底蕴能够转化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动能。两条路径一重反哺、一重转化,方向有别而殊途同归。由此,分别针对以经济人文化和人文经济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提出差异化对策建议^①。

(一)面向以经济人文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的对策建议

以经济人文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具有较强的文化投入和基础设施优势,但文化资源的市场化运营和产业化转化仍显不足。以苏州为代表的此类城市在“文化服务贸易额”“创意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文化相关专利数量”等指标上表现相对偏弱。据此,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补齐短板:一是推动文化设施从重建设向重运营转变。建立以使用率、服务人次等为核心的效能评估机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以经济人文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与“以人文经济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是基于苏杭比较提炼出的理想类型,并非对全国城市的系统分类。其区分主要依据路径识别维度的相对侧重:“以经育文”“以经成人”表现更为突出者更接近前者,“以文兴经”“以人促经”优势更明显者更接近后者。具体分类阈值及类型边界仍有待通过扩大城市样本进一步检验。

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运营,提升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率和内容供给能力。二是依托制造业优势提升文化服务贸易。推动工业设计、品牌策划、非遗授权等文化服务嵌入制造业价值链,促进非遗技艺与工业设计、品牌开发、海外营销融合,支持文化企业依托制造业供应链和国际经贸网络拓展服务出口,并完善文化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三是提升文化产业创新产出。围绕数字内容、工业设计、人工智能赋能文化等领域加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完善文化科技成果孵化、专利申请和产业转化机制^①。以苏州为例,应重点将制造业、科研和经贸优势转化为文化服务贸易、创意产业增加值和文化相关专利等实际产出。

(二)面向以人文经济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的对策建议

以人文经济化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市具有较强的文化价值转化能力,但公共文化基础和产业投入相对薄弱。以杭州为代表的此类城市,在“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业投入”方面存在短板,其中“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积”相对偏低。据此,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巩固文化资源转化优势。加强文化IP开发与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与数字内容、文创消费、沉浸式体验等业态融合,提升文化资源产业化能力。二是补齐公共文化设施供给和文化产业投入短板。在人口和产业集聚板块,将公共文化设施纳入产城融合规划,明确新建片区文化设施配置要求,并利用社区、商业和园区存量空间嵌入文化设施;同时强化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支持,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扶持力度。三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深化馆校合作,持续开展阅读推广、艺术普及和非遗体验,依托文化特派员等制度推动优质资源下沉。以杭州为例,应重点通过新兴城区设施补建、存量空间利用和产业投入支持,提高公共文化设施供给水平。

最后,无论选择哪类路径,都应坚持以人为本,将教育、文化、健康等社会福祉纳入城市人文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同时,建立涵盖文化设施效能、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服务贸易及创新产出的常态化监测机制,并加强跨区域文化科技、文创设计与非遗产业化合作,以此推动两类路径优势互补,形成可复制的人文经济实践经验。

Measure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omparison of Regional Models in Chinese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and Hangzhou

Wei Peiye¹ Zhang Jiaqi¹ Song Lu^{1,2}

(1. School of Smart Gover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zhou 215123, P. R. China;
2. Suzhou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stic Econom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zhou 215123, P. R.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s,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valorization of humanistic resources constitute two major pathways toward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and shared flourishing of the economy and the humanities. Suzhou and Hangzhou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exemplars of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vitality 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making them representative cases for studying China's humanistic economy. This study refine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stic economy in Chinese cities. The system comprises six key dimensions—Shaping People through Culture, Empowering

^① 周绍东、李靖:《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年第5期。

the Economy through People, Nurturing Culture through the Economy, Advancing the Economy through Culture, Fulfilling People through the Economy, and Renewing Culture through People—and includes 19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36 tertiary indicators. Taking 2025 as the reporting period and using the latest available data for each indicator, mainly from 2023 and 2024, the study constructs a cross-sectional datas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stic economy in Suzhou and Hangzhou. It then employ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determine indicator weights, followed by data normalization and standardized scoring,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and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humanistic economy in the two cit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Suzhou and Hangzhou share a common foundation of profound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vibrant cultural vitality—as most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ir parallel strengths in Renewing Culture through People and Shaping People through Culture—their distinct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governance logics have led them along markedly divergent development pathways. Suzhou exemplifies the logic of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displaying clear strengths in Nurturing Culture through the Economy and Fulfilling People through th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foundation, with the strength of its manufacturing economy supporting investment in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s in public well-being. Hangzhou, by contrast, exemplifies the logic of the economic valorization of humanistic resources and performs particularly well in Advancing the Economy through Culture and Empowering the Economy through People. Its development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vitality and digital innovation into economic momentum.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common foundations and divergent pathways of the two development models and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ities whose primary development pathway is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should shift their focus fro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war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ultural output and fostering an ecosystem for humanistic innovation. Cities whose primary development pathway is the economic valorization of humanistic resourc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services, thereby enabling the economy and the humanities to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flourish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humanistic economics, offer a replica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ross-city comparison,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cit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at seek to achiev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the humanities.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Indicator system; Regional comparison; Hum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Economic valorization of humanistic resources

[责任编辑:郝云飞]